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八卷

政治军事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 需要公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94400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政治军事编

200420598

第八卷 （20—8）

党　　派
社　　团
军警宪特及其他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北京

目　录

第八卷

（一）国民党·三青团

1912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办理选举的
　经过 …… 仇　鳌(1)
中华革命党始末 …… 施方白(6)
国民党改组前四川国民党派系争
　夺战 …… 严啸虎(15)
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 周一志(20)
关于大同盟的回忆 …… 张润三(29)
国民党CC派系的形成经过 … 胡梦华(37)
关于再造派 …… 周一志(59)
我所知道的改组派 …… 范予遂(64)
国民党改组派在
　河南 …… 李武乔　张汉英(75)
“非常会议”前后 …… 周一志(78)
关于“新政学系”及其主要
　人物 …… 王又庸(87)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 … 康　泽(96)

（二）民主党派

从东方文化协会说到民革的
　建成…… 朱汉英(102)
在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中的
　活动…… 侯外庐(106)
回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甘祠森(115)
“民促”在河南策动蒋军起义
　经过…… 蔺洛涛(141)
海南民革史略…… 冯仁鸿　韩锦元(146)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起成立之经过
　略记…… 梁漱溟(150)
中国民主同盟的由来和
　演变…… 叶笃义(156)
抗战期间云南的民盟工作和民主
　运动…… 楚图南(160)
策动西康地方武装起义的
　经过…… 彭迪先(164)
解放前夕张澜在上海…… 张茂廷(168)
张志和的革命活动…… 张敦英(174)
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
　经过…… 张　帆(178)
邓演达回国组党…… 罗任一(182)
毛主席和九三学社…… 许德珩(189)
从科学座谈会到九三学社…… 谢立惠(192)
台盟的诞生经过…… 徐萌山(197)
关于救国会的一些回忆与
　认识…… 孙晓村(200)
陶行知二十六国行…… 杨明远(203)
我国政治舞台上的“职教
　派” …… 尚　丁(211)
我参加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的
　经过…… 朱学范(217)

（三）其他党派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若干
　史实…… 郑佩刚(224)
青年党的前期活动…… 汪　潜(242)
民社党和青年党在山西的
　活动…… 董维民(253)
安那其主义者在福建的一些

China

活动…… 秦望山(256)
“湖北和平运动促进会”前后——兼及
赴解放区见闻…… 李书城(268)

（四）国民党的特务活动

中统20年 …… 张　文(279)
我所知道的中统…… 刘　恭(336)
中统与我…… 孟　真(362)
我的特工生涯…… 黄　凯(369)
廖承志遭秘密逮捕关押之
经过…… 庄祖方(381)
复兴社的缘起…… 康　泽(389)
法西斯组织内幕片断回忆…… 卞西九(398)
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
及活动情况…… 邓葆光(407)
余恨未消话戴笠…… 宁向南(424)
蒋介石阴谋暗害宋庆龄…… 沈　醉(427)
史量才被暗杀案真相…… 钱芝生(430)
宣侠父被害记…… 张严佛(434)
唐绍仪被暗杀案与赵理君
之死…… 艾经武(437)
河内谋刺汪精卫行动…… 王方南(440)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事件
始末…… 吴竹亭(444)
抗战时的对日无线电侦破…… 李直峰(449)
军统电台与汪伪特工电台的
内幕…… 潘光祥(450)
威尔斯亲王号被炸前的破
译战…… 鲍志鸿(454)
重庆稽查处内幕…… 易啸夫(455)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沈　醉(468)
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情况
琐记…… 文　强(492)
国防部保密局内幕…… 沈　醉(502)
策划暗杀龙云的经过…… 郭　旭(530)
暗杀杨杰纪实…… 郭　旭(532)
杨虎城将军被囚禁惨杀的
经过…… 沈　醉(534)
重庆大屠杀大破坏自述…… 徐远举(540)
国民党炸毁广州海珠桥
前后…… 程一鸣(554)

（五）海军·空军·警察·宪兵

旧海军生活见闻…… 周应聪(557)
东北江防舰队…… 王时泽(573)
东北海军的建立与壮大…… 张凤仁(576)
怀念英国的海军教官们…… 刘应霖(585)
中国的第一所航空学校…… 吴承禧(588)
旧中国航空界见闻…… 蒋　逵(589)
东北航空军建立始末…… 孙继先(604)
回忆东北空军…… 孙　炎(609)
云南空军始末…… 张汝汉(615)
国民党空军指挥机构的
演变…… 方　耀(625)
蒋介石建立空军的内幕…… 许念晖(633)
蒋介石集团空军派别的片断
回忆…… 陈应昌(635)
国民党空军入伍生总队在
铜梁…… 胡远信　张钞(640)
我国警政的由来…… 恒如馨(642)
解放前夕的北平市警察局…… 李　芳(643)
解放前的成都警察…… 熊倬云(646)
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概况…… 袁辟璋(656)
谷正伦与国民党宪兵…… 卓建安(667)
罪恶昭彰的宪兵第四团…… 何　震(681)
七七事变前后国民党宪兵特高组
防日反间活动…… 贾贤瑞(689)

（六）军政学校

四川的军事学堂与川军派系的
形成和演变…… 张仲雷(700)
从陆军小学到保定军校…… 汪云台(708)
回忆保定陆军速成学堂…… 杜如松(712)
记保定军校及校长蒋方震…… 杜　伟(715)
湖南陆军小学…… 戴凤翔等(719)
云南讲武堂的回忆…… 周开勋(722)

China

清末陆军贵胄学堂第二期的
回忆…… 韩世儒(727)
辛亥革命时的广西陆军干部学堂
和陆军小学堂…… 李书城(733)
东北讲武堂…… 郑殿起(735)
东北讲武堂北京分校始末…… 姜明文(746)
忆陆军大学…… 萧开训(752)
忆福州海军制造学校…… 张宝骐(758)
烟台海军学校的始末…… 陈文会(763)
蒋介石空军重要训练基地——笕桥
中央航空学校…… 陈栖霞等(766)
旧中国警察教育概述…… 冯子厚(776)
国民党兵工学校追忆…… 杜文若(781)
回忆云南法政
学校…… 于乃仁 于乃义(786)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 承纪云(794)
记同泽新民储才馆…… 李荫春(803)
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 储子润(811)
国民党中训会和中训团的来龙
去脉…… 刘瑶章(818)
民族革命大学见闻录…… 秦丰川(828)

(七) 立法·司法

众议院12年见闻实录 …… 陈九韶(832)
“行宪立法委员”竞选记…… 邹树文(845)
行宪立法院建立初期…… 张潜华(847)
谢冠生与国民党司法界…… 金沛仁(852)
辛亥前后的广东
司法…… 汪祖泽 莫擎天(857)
解放前广东司法界的黑幕…… 黄韶声(862)
闽省旧法院见闻琐录…… 林翰英(871)
韩复榘审案实录…… 乔新尘(876)
县参议会竟有杀人权…… 咎元磊(878)
旧监狱内幕…… 朱蔼民(880)
旧监狱见闻…… 袁竹安(886)
与金树仁谈金树仁案…… 濮清泉(892)
我在西北青年劳动营…… 董万禄(903)
我从事军法工作的始末…… 张运遂(909)
刺汪英雄在贵州获释…… 刘澄清(919)
从公审周佛海看蒋伪合流…… 刘子暌(922)
关于杨淑慧营救周佛海的
见闻…… 丁绪曾(926)
汪伪要员林柏生受审旁
听记…… 许自强(929)

(八) 军委会侍从室·总统府

蒋介石的侍从室纪实…… 秋宗鼎(931)
我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片断
回忆…… 黎天荣(956)
我在侍从室及“总统府”的
见闻…… 朱永望(967)
我当蒋介石侍从医官的
见闻…… 吴麟孙(975)
对国民政府总统府军务局的
回忆…… 吴行中(979)
南京国民政府和总统府见闻
数则…… 汤又新 丁绍兰(986)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国民党·三青团

1912年筹组国民党湘支部办理选举的经过

仇　整

辛亥革命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军阀篡夺了政权；同盟会内部起了分化，组织趋于涣散，成员中有一些人实际上离开了组织，有一些人则另树旗帜，组织了中华民国联合会和民社等团体。原来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取消了，其成员分别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和国民协进会等团体。不久，这些原非同盟会的团体和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团体，合并组成统一党，以后又进一步扩大组织，并改名为共和党。与此同时，还产生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民国公会、共和促进会和国民新政社等较小的团体。

当时参议院中，还是以同盟会为第一大党；与同盟会相抗衡的共和党为第二大党；介乎二者之间的统一共和党为第三大党；此外就是以上列举的那一些小党派。同盟会虽然是第一大党，却没有能够占到压倒的多数。同盟会面临着同袁世凯及与其相援结的共和党在参议院内、外的斗争，同时又处于小党林立的形势。这对同盟会显然是不利的。为了改变这种形势，同盟会的主要骨干分子宋教仁主张联合政治主张相接近的一些小党派组成为一个压倒一切的大党。经过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1912年8月，同盟会便和参议院内的第三大党——统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就是争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多数议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组织责任内阁，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虽可继续选举袁世凯，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内阁；而内阁必须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组织，才能根据约法发挥政党的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轨。要实现这一目的，则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须把全国各地的党部，好好地组织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马上做出详细计划：第一、派人到各省成立国民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议会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议会民主制；第四、及早准备组织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且预定以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为了实现上述计划，同盟会还在未改组以前，就已注意物色各省组党和掌握选举的负责人。当时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较复杂混乱，像湖南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情况复杂混乱的省份，人选更宜郑重考虑。

湖南在辛亥起义以后不久，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宪

China

政派的谭延闿，因利乘便，继任都督。当时湖南政局极不安定。同盟会对焦、陈被害，深为愤慨。反动势力虽然阴谋杀害了焦、陈，但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不能不使他们反侧不安。湖南响应首义比较仓促，同盟会对政治工作的准备不足，干练一些的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南；比较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原任司法司长的洪春台，隐隐成为湖南同盟会的重心，不幸在这时候死了。湖南方面向北京请示，要求派人回去主持。

同盟会在北京的负责人要派我回湖南，负责党务和选举工作。那时国民党改组正在进行，成立大会还没有开，总部还没有成立。作为一个老同盟会员，对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和进一步经过竞选而成为议会中的多数派以实现政党的责任内阁的计划，我是始终与闻，而且完全赞同的。但是我当时在北京办报（亚东新闻），无意办党和从政，所以对于回湘的使命，再三推辞，不肯担任。经过北京负责方面的再三敦促，并同意了我所提出的在办理改组和选举工作后引退的条件后，我才接受任务，于1912年六、七月间回到湖南，筹备党的改组工作，并负责掌握湖南的选举。

当时湖南政治上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会党在湖南首义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影响。

同盟会和以前的华兴会，一贯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1906年湖南哥老会的焦达峰加入同盟会，后来被推为调查部长，专负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任务。他联络各省会党首领，共同发起组织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运动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共同参加革命工作。1909年，焦达峰往来湘鄂之间，在汉口设立共进会的总机关，在长沙设机关部。在共进会的策动下，两湖的革命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

1910年，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策划长江流域各省的起义；并以共进会和其他的会党团体为基础，成立湖南、湖北两省分会，委派焦达峰主持湖南的革命活动。

这种联系和利用会党的策略，在当时是收到很大的效果的。1906年的萍、浏、醴大起义，就是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由当地的哥老会、洪福会、武教师会等团体搞起来的；武昌起义和湖南响应时，都曾得助于会党的力量。所以湖南起义后，焦达峰被推为湖南都督，是顺理成章的。

会党在辛亥革命时，虽然表现了它的力量，起了积极作用，但在起义以后，要搞政治斗争和政治建设时，它就一筹莫展了。所以反动派得乘机钻入，阴谋破坏，利用反对所谓“江湖作风”为口实，进行煽风点火，造成杀害焦、陈的事变。

事变以后，湖南政治上的中心力量，还是在同盟会方面。而同盟会却拿不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当时我把北京方面所决定的一套办法拿出来，同时针对湖南的具体情况，提出我的主张和办法。当然，在当时的动荡和混乱的情况下，能够拿出政治上的一套办法，是各方面一致欢迎的。

我回湖南不久，经过多方联系商洽，自同盟会内部以至政治上、社会上的各方面人士都认为我所拿出的办法很好。因此，我能够得到各方面的合作，而顺利地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

为了实现此次回湘所负的使命，首先必须把湖南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在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之下，形成一个联合战线，以便和袁世凯所代表的极端反动的军阀、官僚势力

China

作斗争。

原属同盟会会员和不属同盟会的革命派人士，是国民党的基本队伍，当然是我首先应该团结的力量。他们对于原来的“江湖作风”有些不满，但又苦于拿不出更好的办法。在和我接洽之后，马上消除过去的徬徨苦闷的情绪，满怀信心地团结到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发挥各个人的力量。

同盟会内的会党分子，对于焦达峰的被害，一直气愤不平。我过去参加革命工作时，既搞政治，也搞江湖，略为懂得江湖的一套。我回湖南后，特别拉拢他们，但同时把现在不能搞“江湖”一套的道理，向他们反复说明。经过一番努力，一方面缓和了他们的不平之气，一方面使他们接受我的一套政治办法，而积极参加到组党和选举的工作中来。

原属宪友会和辛亥俱乐部的人们，过去都是一些改良主义者，但在辛亥革命之后，他们中间许多人不得不隐蔽君主立宪的思想，对于议会民主制表示赞同。因此，经我稍加拉拢之后，大多数都转到我们的旗帜下来了。

当时的湖南都督谭延闿，他过去是宪友会在湖南的主干。革命成功以后，他的思想情况，当然与上述的宪友会分子基本相同。在焦、陈被害以后，湖南政治上没有重心，他就应运面起。我当时对谭这个人的看法是：他对于孙中山、黄克强和同盟会的力量，是看得到的，因此不敢过于立异，公然站在反动的一边；但是要他真心地站在革命方面来，当然也不可能。在焦、陈被害以后，同盟会与谭延闿有矛盾，不过比起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矛盾来，就是次要的了。

我回湖南把国民党的一套办法对谭延闿谈了，他很表赞同。以后，凡是我们提出的办法，他都欣然乐从。后来黄克强、宋教仁先后回湘，当然与他过去认识的民党人士不同，使他对国民党的观感有所改变。他说宋教仁是“崭新的人”，“非一般政治上的人物可比”，因此他表示愿意加人国民党，我们也决定拉他进来。谭在湖南代表改良派和其他一些旧人，把他拉过来以后，这些人也就跟着过来了。

我以前没有在湖南工作过，这次回来，对于湖南的政界、军界、社会人士和江湖朋友都是初次碰头。经过三个月的时间，终于把各方面的力量联合起来。于是一面着手改组国民党，一面布置选举。

因为我是在北京国民党总部成立以前两个月就回到了湖南，从事湖南党的改组工作的，所以在总部成立的通知到湘后，不到一个月，即在9月下旬，国民党湖南支部就正式改组成立了。

为了扩大党的基础，并便利党的政策的推行起见，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谭延闿为支部长，我为副长。实际上，党务工作是由我负责的。以下还有总务主任周声骏、政事主任刘武、交际主任周震鳞、会计主任陈树藩、文事主任吴景鸿。支部内还设有评议会，评议长龙璋，评议员刘人熙、陈强等57人。又设有政务研究会，会长杨德邻，副长罗杰；法制主任彭兆璜，政务主任陶思曾，经济主任周砥，外交主任陈安良，军务主任陈嘉祐，教育主任萧翼鲲。从以上机构的设置和人事的安排，也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所联系的方面之广。

湖南支部成立以后，谭延闿仍任都督，我任民政司长。各县县知事（县长），都是由民政司直接委派的。我当时和谭延闿分工，军事方面由他去对付，政治和社会方面都由我负责。

接着我们就以全力布置选举。这是一个重大工作，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是只可成功，不

China

可失败的。成功的关键在哪里？首先在于民政司。民政司是主办全省选举的机关，民政司长是法定的选举总监督；各区的分监督也是由民政司选派的。其次，在于各县县知事，知事主办一县的选举，并兼县选举监督；可是知事又是由民政司委派的。再就是由湖南支部派往各县组党的人，直接代表党来竞选。

在这里应该补说一点，在我回湘以前，北京方面曾有一个误解，以为选举是由司法司主管的，所以他们布置，要我接任洪春台的司法司。回湘以后，才知道不是这回事，北京的布置错了。那时湖南民政司是刘人熙，乃是湖南的老辈。为了完成选举的任务，由刘人熙让出了民政司，改由我来担任。这样，在选举工作上，才能收到指臂之效。

我到民政司以后，把各县知事作了一番调整。随后派出了五区的选举分监督：一区龙璋，二区苏鹏，三区唐璧，四区戴展诚，五区黄右昌。于是省、区、县的选举负责人，联为一气了。同时，由党支部分派了各县的组党人员，成立县的党组织，并立刻展开竞选工作。到了临近选举的时候，每县都派了选举大员，党也派了视察员下去。我就是这样布置了全省的选举。

从 1912 年 10 月到 1913 年 2 月，全省选举完成。从国会、省议会一直到各县县议会，国民党的候选人都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比例数当选。

湖南的选举工作是以压倒的优势胜利完成了。同时，全国各省，国民党在选举中也都得到了胜利。根据统计，众议院 596 个议席中，国民党得了 360 多席，除去跨党的不计，还有 267 席；参议院 274 个议席中，国民党（除去跨党的）得了 123 席。如果在宪政正轨中活动，不遭到袁世凯的阴谋和武力破坏，国民党既然得到参、众两院的压倒多数，则正式政府的责任内阁，当然非国民党莫属了。

当湖南及其他各省的选举正在胜利进行的时候，宋教仁于 1913 年 2 月，回到湖南，参加竞选。因为临时约法规定，担任组阁的，应该是国会议员。宋教仁回湘后，湖南省议会举他做参议员。由于众望所归，一声喊就把他抬出来了。

宋教仁当时到各处演说，对于时政得失，尽情发挥，无所顾忌。他明白提出：正式总统虽可举袁世凯，但内阁必须以在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以符立宪政治的正轨。同时分析当时选举形势，说明国民党已经肯定要在国会中占到多数议席，因此他决定准备组阁，毫不含糊。这本是当时所谓先进立宪国政治家应取的正常态度，一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又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商谈组阁计划，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谭延闿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因为谭的父亲谭钟麟和袁世凯的上辈袁甲三系拜把兄弟，他想利用谭和袁世凯的世谊关系，在府、院之间起调协的作用。他还提出把湖南民政司长升格为民政长，统辖各司。在都督进京担任内政部长期间，由民政长代理都督职务。

当时谭延闿及其他参加讨论的人都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我没有表示同意。宋、谭当时再三劝我同意这个布置，我坚决不肯，并说，等选举结束后，一定要离开湖南。争论了一晚，他们最后叫我不要反对这一整个的布置。我说，对于计划本身，我不反对，但对我个人有关部分，必须重新考虑。谁知他们认为不反对就是赞成，宋教仁根据那晚所谈，即时把他的全部计划，电告国民党北京总部去了。

原来袁世凯派有侦探驻在长沙，探得了宋教仁准备组阁的全部计划，报告了袁世凯，因

China

而促使了袁世凯急于刺杀宋教仁，不能等他回到北京。因为宋一到北京，根据约法组织内阁，是无法加以阻止的。

不久，宋教仁在上海被刺。袁世凯大肆搜捕国民党人，公然毁弃约法，停止国会，实行独裁。国民党的实现议会民主制的想法就这样终于破灭了。

至于我个人，原来打算在湖南选举结束后，即行离湘。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更促进了我的去志。袁世凯对于湖南国民党人士，必欲得而甘心者，有当时叫出的“麟（指周震麟）、凤（指谭人凤）、龟（指我，因为‘鳌’字的本意为‘海中大龟’）、龙（指龙璋）”四人，也使我在湖南待不下去。因此之故，不久我就离开湖南了。

中华革命党始末

施方白

中华革命党成立前后，正值反袁斗争是当时国内的政治中心。际此期间，我参与了一些活动，兹根据亲历和见闻，追述几桩历史事件。所撰以事件为主体，不全按时间顺序，是为杂记。

浩然军事学社的开办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得以暂时巩固；遂变本加厉，排除异己。是年 10 月 4 日，袁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和各省的议会，通缉参加护法的有关人员。一部分国民党员逃亡日本，至 1913 年底，已有千人。唯十之八九神情沮丧，黄兴、谭人凤等甚至有十年以后再谈革命之说。孙中山则意志坚定，且有组织中华革命党之准备。

这时，孙先生派居正、陈其美、周应时、廖仲恺、谢持等分别将亡命日本的党员调查清楚以后，于 1913 年冬末，在离东京约 20 华里许的大森新井宿开办“浩然军事学社”（门外悬“浩然庐”），以培植青年党员。这是中国革命团体创办学校，训练党员之开端。浩然军事学社只办了一期，学生约一百四五十人。同学的名字，我还能回忆到的，只有熊罴士、李一球、吴先梅、李海秋、丁联英、胡景翼、杨益谦、李武、陆韬、吕超、赵铸之、陆初觉、华玉梁、丁士杰、陈钧石、欧阳豪、赖成、邓柏年、陈冬青、徐桂八、钱大钧、黄天雄、周贯虹、殷汝耕等。全国解放后在大陆参加工作的，据我所知，有湖北省之江庆龄、江苏省之施方白、北京之李明扬、陈铭枢等四人。

“浩然”校舍是临时修设的，学生全部在校内膳宿。课程纯为军事。教员除了教筑城学的周应时，教日文的殷汝骊外，全自日本士官学校请来，讲义也是全部采用士官学校的。开课不久，学生分别宣誓入党。又过了两三个月，中华革命党开成立会。孙先生委派各省支部长为召集人。江苏省为吴藻华（号仲常，宜兴人），吴即召集已入党之“浩然学社”江苏学生陈钧石、李海秋、陆韬、施方白，以及非“浩然”生陈军亮、韩恢等在民国社开会，讨论江苏省党务的进行事宜。周应时（号哲谋，启东人）以总部人员资格出席指导。结果决定分科负责办事，我被推任财务兼党务科长。这天在民国社参加中华革命党江苏支部成立会者共八人。其中韩恢于 1916 年成仁于南京雨花台下；李海秋于 1917 年就义于上海；余均病死，今仅存我一人。

“浩然”成立后不久，孙先生又在东京设立政治学校。课堂借设于日本法政大学，授课者多数是法大教授。“法政”学生也是一百四五十人，解放后任内务部参事之于若愚，以及在台湾之广西人雷殷，都是那时政法学校学生。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时在孙先生之侧者，有胡汉民、廖仲恺、陈其美、朱执信、许崇智、邓铿、居正、田桐、谢持、戴传贤、邹鲁、邵元冲、周应时、杨庶堪、丁仁杰、王统一、何天炯等多人。孙先生一面派人调查登记亡命之党员，重行办理入党手续；一面兴办政法、军事两校，选择青少年党员集中训练，以备再举革命。凡党员中之寒苦者，除制发衣服外，并月有补助。孙先生因鉴于国民党之组织不缜密、分子太复杂，非用严密方式吸收党员不可。所以规定凡入中华革命党者，不论新旧党员，一律要亲书誓约，宣誓加盟，其誓约如下（原文）：

立誓约人×××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①]、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大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掬诚谨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服从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民国×年××月××日

××省××县人×××（按左中指模）

介绍人×××

在中华革命党未开成立会之前入党者，均亲写誓约，由介绍人引至孙先生前，高举左手，手心向天，立正宣读；读毕，按左中指模后，捧呈孙先生，孙先生将誓约编次后，起立握手，告以入党号数（我为307号），并简单训示，或垂询数语而退。其后印有空白誓约，主盟人分派资深的同志担任。唯主张“非再过十年，不能谈革命”的，不同意誓约中“附从孙先生”等语的，反对按指模的，纷纷离开东京转赴南洋各地及欧美，约有数十人。1914年6月22日，中华革命党召开预备会，到会者200余人，一致票选孙先生为中华革命党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住地精养轩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500余人。签到时各发红白缎织别针一只，插在胸前，进人会场。开会时孙先生亦当众宣誓加盟，主盟人为胡汉民。孙先生的誓约内容，与一般党员略有不同，谨录于后：

誓　约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尽忠职务；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① 誓约手迹如此。

China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

民国3年7月8日立。

是日孙先生演说，时间在两个小时以上，其词略谓：……文以三民主义号召革命，然国民久压于满清，感而从者，多在狭义排满。一旦清廷既倒，革命之气，遂一落千丈。一般人复惑于“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说，竟改革命党为政党。继复合数党而成国民党，官僚政客，投机分子，纷纷搀入，致质体皆为变化。故同盟会能以少数党员从事革命，不数年而将满清推倒。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数十万军队举义讨袁，不匝月而一败涂地。革命事业之不能一刻疏忽，不能一步放松，于此可见。讨袁失败以后，袁世凯益肆无忌惮，废约法、杀党人、逐议员、任宵小，更勾结帝国主义，不惜丧权卖国以阴谋帝制。而党员之在国内者，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海外者，亦多堕志丧气，甚有投降自首，或创“十年后再谈革命”之说。文不忍置20余年牺牲无数同志而缔造之三民主义于不顾，乃再举革命，所以组织中华革命党……孙先生末了说：“革命是要牺牲个人之一切利益而要替大多数人谋幸福……”这真是千古不易的革命原则。

中华革命党总章共39条，是孙先生手订的。其第二条：“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第四条：“本党进行秩序分作三时期：一、军政时期；二、训政时期；三、宪政时期”；第七条：“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第十条：“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并另规定，凡在革命军起义前进党者，名首义党员。旋发表宣言及主要工作人员（略）。宣言中指出，国内之国民党被袁世凯解散，当然已不能存在，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布解散外，其余在美国南洋各地者，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

各省市负讨袁军事责任者：长江方面陈其美；江南吴藻华；江苏周应时、韩恢；广东朱执信、邓铿；山东居正；湖北田桐、蔡济民、吴醒汉；上海范鸿仙；江西夏之骐；浙江夏尔玛；湖南林德轩、林修梅、曾杰；广西刘崛；四川石青阳、吕超；贵州安健；皖北毕清波；皖中金维系；皖南张孟介。

规定中华革命党总理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监督指挥全国军事行动；负全省军事责任者为司令长官；负一处军事责任者为司令官，共同担任各省革命军事之进行。

中华革命党的言论机关

1914年春，中华革命党正在酝酿组织期间，孙先生令居正（笔名东辟）在东京发行《民国》杂志，主编者胡汉民，撰述者田桐、朱执信、戴传贤、邵元冲、邹鲁、杨庶堪、廖仲恺等。《民国》杂志社门首，悬牌“民国社”，乃为中华革命党在日本公开的通讯处，也是一般党员的约会聚处所。

大约在1914年夏，美洲华侨同志也发行一种反袁杂志，名曰《民国》，以响应中华革命党的活动。

南洋华侨同志陈新政等于1911年在槟榔屿办了《光华日报》，又在新加坡创办《新国民日报》，以壮声势。在香港方面，又有《香江晨报》和《大光报》的出版。

China

国内的言论机关，自讨袁失败后，被封禁得干干净净。即或从海外或香港寄至内地的反袁刊物，也都被检去，焚毁无遗，甚至将收受刊物之人拘去坐牢杀害。这是从1913年秋末到1916年夏，在袁世凯淫威之下，整个二年半内的情况。

1914年冬，孙先生先后派陈其美、周应时、吴藻华等率领同志回到上海进行党务军事工作。1915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帝国主义进行世界大战而无暇东顾，中国国内又有袁世凯想做皇帝的机会，向袁世凯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五项21条款。5月7日又提出最后通牒；5月9日；卖国贼袁世凯除对第五部分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四部分完全承认，激起了全国人民一致反对，才未能实行。陈、周等以袁世凯丧心病狂日甚一日，非向国人宣布其罪状，发扬本党的主张不可，故即令施方白筹办一报，并指定以“五七”为报名。这张小小的《五七报》是讨袁失败以后，在上海以至全国第一张出世的党报。

《五七报》于1915年5月20日出版。编辑部设在当时称为法租界宝昌路贝勒路口的一间小楼上，施方白任经理，特约撰稿者张少屏、陈位五、孔樨圭、茅祖权、施述之等十余人，主编者高穹庐。该报系四开版，初印2000张，后加印至5000张。因该报被袁政府禁邮寄，否则销场当不止此数。此时，上海有一张袁家机关报，曰《大共和日报》，日出对开两张，执笔者为李涵秋、张丹斧辈。报价和《五七报》一样，只售铜元两枚，但日售不满百份。当时上海市民同情反袁，于此亦可见一斑。

《五七报》出版后，对袁世凯丧权辱国，阴谋复辟帝制之伎俩，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因此，袁家党恨之入骨，始而禁止邮寄，继而通电全国不准阅看。但订阅者有增无减，有托民信局、轮船局作包裹送寄，代为发行者；有愿出重价加封邮寄者。于此可见反动统治钳制舆论与查禁书报等毒辣手段是无多大效力的。袁家走狗见《五七报》如此畅销，且仍流入内地，甚至北京市内也时有发见，于袁家帝制大为不利，遂在内地大捕《五七报》的读者，加以“乱党”的帽子。一面电饬江苏巡按使齐耀琳；齐转电上海交涉员杨晟，请求法租界当局禁止《五七报》出版。终于在6月18日的下午，法国捕房派探长沈德福来报社声称：因《五七报》常常骂总统，并说总统要做皇帝，故定次日上午到公馆马路公堂审问。沈当即抽出一纸，于其上指定一角，要我签字。我即写“方天权”三字。沈去后，我即将被传情形告陈、周、吴等，并商讨到公堂如何应付。他们见我衣着破旧，头发太长，当即给我15元，让我去购买衣鞋和理发洗澡。第二天我衣冠整齐去上公堂。被传到庭者除《五七报》外，另有三家报馆，即《公论报》：言论灰色，偶然也有不甚赞成袁世凯的言论。到庭者名贾公谔，听说后来在新民里炸弹案中丧生；《爱国报》：本由投袁党人何鸣出钱所办，不知何以也有些反袁。到庭者名顾振黄，号息疚，阜宁人，时年约三十五六岁，后来同伏龙、龚士芳、万鹏等13位同志赴南通举义，悉被土皇帝张某令镇守使张仁奎枪杀。《救亡报》：平日很同情反袁，到庭者名曾孟鸣，广西人，当时是一位热心革命的同志。后来做过大官，发了大财，1929年病殁于上海。

正9时，法租界公堂开庭。中外两官并坐，右为中国官，姓聂，忘其名，就是中国官厅委派的所谓陪审官。桌上堆了很多报纸。法官首呼《公论报》，态度尚平和；次呼《爱国报》，态度凶恶起来。再次呼《救亡报》，态度更加凶恶了。末了轮到我，中国官首先怒目注视我一下，然后审问一番。问毕，连声“哦！哦！哦！”一面翻阅《五七报》，喉管里“吓”的一响，右手一拍，喊叫道：“《五七报》太不成话了！竟敢把大总统骂到这步田地，并且说大总统要做皇帝！（手又一拍）简直是荒唐，法兰西也是民主国，也有大总统，你看法国的人民哪里有

对大总统这样态度的?”我即申辩说：如果中国的政治，中国的总统也和法国一样，那我们还说什么话？这就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的一个例子。说到做皇帝，那是事实俱在，可不必讳言。……只见中国官对外国官说的一句什么话点了点头，在点名单上写了几行红字，立即宣布：“《公论报》从轻发落，以后言论要格外留心！《爱国报》、《救亡报》各罚洋 50 元；无洋，各押一月。《五七报》罚洋 100 元；无洋，改押三月，报馆封闭。”旋即退堂。照当时所谓法公堂的判词，明明是说《五七报》如不能缴 100 元罚款的话，那是要改押三个月，并且要封闭报馆的。但我们当时即将罚款如数缴足，本应当三个月也不押，报馆也不封闭的。因此第二天《五七报》照常出版，且对于被传审、罚款一事，记录得非常详细，词句间对于袁世凯、齐耀琳、杨晟辈更加不客气了。谁知道发报不过一小时许，即有一个巡捕搜得《五七报》约百多张，神情紧张地来说，“《五七报》业已封闭，你们为什么仍然出版？捕房所以不来封馆，是顾全你们的面子，为什么你们反而和捕房作难起来？快搬走！快搬走！”这时我们才知道不论缴款与否，报馆是一定要封闭的。事已至此，也无可如何。我们立刻在门口贴一张“本报业已停版”的纸条。另由撰述员陈立五（高淳人，是当时一位热心服务的同志）写一个“天中报”三字报头，并且由他亲自送刻。次日《五七报》以《天中报》作化身问世。不料又招来捕房的警告，《天中报》也只得停刊了。

当时资产阶级在上海办的《申报》、《新闻报》、《时报》等，照常出版。它们对于袁世凯的恶劣行为，既不同意，也不敢表示反对。到了 1916 年 1 月 1 日，袁世凯通令全国改称“洪宪”，不准再称“民国”，如果报纸不印“洪宪”二字，即不准邮寄。因此，上海日报公会决议在报头下特用六号字排“洪宪”两字以应付之，但不排元年字样而另以干支“庚辰”纪年。这可说是当时上海各报为对付袁世凯而用的策略，也暴露了自己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到 1916 年 3 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废止洪宪年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和《中华新报》等相继出版。追袁贼身死，各地的宣传刊物，又勃然而兴。

沪军镇守使郑汝成伏诛

1913 年秋，党人兴师讨袁。袁世凯以江南，尤其是上海为“乱党”发源地，故派其忠实走狗、残杀党人之刽子手郑汝成率十余万人镇守上海，任上海镇守使，任务是防制“异动”，残杀党人。仅就 1914 年 9 月份计，即杀害党人 87 名之多（据当时任职于镇守使署的皖人郑某统计）。所以当时谚云“镇守使署鬼门关，党人只去不再还。”在沪党人再三商讨，以为如欲工作顺利进行，并为死难同志复仇，只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经陈其美最后决定的。但是花了好久时间，费了好多心血，终无确实把握，而郑汝成的暴戾行为日甚一日。凡参与此项密谋的同志，无不焦灼万分，其中尤以浙人周淡游为甚。淡游和我时常见面，平日沉默寡言，处事周密，甚少激烈之言语。独对于杀郑汝成一事，主张最烈。

1914 年 11 月 10 日为日本天长节（即日皇生辰）。上海日本领事馆照例举行典礼，并招待外宾。郑汝成为当时上海的最高级军事长官，而且为了追随袁世凯一贯的媚日态度，当然要亲往祝贺。陈其美事前已探听明确，即令周淡游、李海秋主办其事。因淡游主诛郑最力，且素与郑相识，当时中华革命党所有驻沪勇士，全部归他接洽招待，故此事由淡游指挥。时上海日本领事馆在外白渡桥北堍右转弯处。汽车过桥照例须缓驶。三刺客（王晓峰、王明山二

勇士及另一南方人）即候在外白渡桥北堍。11 时许，郑汝成的汽车开至外白渡桥北堍，正缓驶而过的时候，王明山故意闯至车前举手高喊，司机恐肇事，立即煞车。明山乘此机会，很沉着地连掷两弹。刹那间，玻璃与弹片齐飞，汝成与司机皆倒。晓峰恐其不死而遗后患，即登车向郑汝成射完预先装就的两梭子弹，郑立刻脑浆迸裂，当场毙命。两位王勇士见目的已达，放声大笑，弃枪举手，从容就捕，终至成仁。另有一人则安然归来。上述行刺经过，大半出于此人之口。

吴先梅剪除蒋士立

浩然军事学社学生中有一名吴先梅者，大约在 1914 年秋，我常见到他支颐凝神，若有所思。我一再问故，他总是闪闪烁烁，不肯具体回答，只说将来一定会知道的。1915 年春，某晚，东京各报忽出号外，载称：有一支那人名蒋士立者，系袁世凯总统的特派员，于某时某刻在神田区某町某番寓所被刺，中三枪未死，已送某某医院医治。新闻中未提及事件的原委及行刺者。翌日各报普遍刊载吴先梅的照片，并且说他是暗杀蒋士立的重要嫌疑犯。不过始终没有听到他被捕的消息，同志们也不知道他的行踪。直至这年冬季，我才知道他重现于沪滨。此时他的面容较前为瘦削，沉默寡言，每遇陌路人客，常避入他室，或作假寐而不愿与人交谈。

40 年之后，我任职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有同事于若愚与吴先梅及“蒋案”主谋覃振友善，后来又同访当时和覃振同寓日本的覃宋夫人，对这件疑案才算有较彻底的了解。

蒋士立，四川人，1914 年春奉袁世凯的命令到日本侦探流亡在日本的党人行动，并行使其利诱和陷害的毒计。其利诱方法有三：(1) 送回本国做官；(2) 送入日本学校求学；(3) 既不愿回国，又不愿求学者，每月发给生活费 32 元。但是得首先用书面承认过去的反袁是大逆不道的；每星期最少要报告党方消息及党人的行动一次；并绝对不许自由行动。其陷害的方法是到处探听党人的行动，随时密报国内，伺机拘捕屠杀。因之，在日本作亡命客者，人人自危，遂密谋对付之策。尤其覃振（号理鸣）最为起劲。吴先梅自告奋勇，愿负除害具体责任。时有一岳阳人名周鳌山者，是蒋士立的狗腿子，曾拉拢若干党人入蒋彀中，故蒋视周如左右手。周鳌山向善周旋，与覃振为旧识。一日，访覃不值，留名片而去。覃得周片，喜甚，遂利用此片，仿效周的字体，介绍某人（用假名）见蒋。是日大雨之夜，吴先梅持片前往。蒋同他的秘书下楼接见。秘书在前，蒋行在后，秘书与先梅握手，伪说是蒋士立。但是先梅早已获得蒋的照片，已明见蒋士立立于其后，于是毫不踌躇地摸出手枪，对准蒋的胸部开枪。蒋立而未倒，先梅又连发两枪，蒋方仆地。先梅见目的已达，就大踏步而出，隐匿于浅草某妓院特别室。

日本警局早已明了蒋士立的被刺，“亡命客”有重大嫌疑。于是全体动员普遍检查亡命客之住所。检查后发现独有吴先梅不知去向。遂将在吴寓所搜得的照片给蒋士立的秘书察看，秘书证实行刺者就是此人。因此，日本警局即确定吴先梅是刺蒋犯，将吴的照片刊载各报，通缉于全国。一面分别传讯平日与先梅有往还的党人二三十人。林修梅、林伯渠、于若愚等均在被传之列。到了第三日，覃振被传。其雇用的 15 岁的下女作证，说覃振是吴先梅的好朋友，时常和吴先梅游园观剧，小饮谈天，并且说吴先梅于蒋士立被刺的第二天清晨来过覃之寓所，

China

在四五小时以后为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带走。因此，覃振遂被拘禁。覃之辩护律师在辩护状上强调说，警局以未成年的下女作证，没有法律根据。因之，警局不得不将覃振释放，前后拘禁 20 余日。

吴先梅行刺后，藏在浅草妓院。看到蒋士立未被刺死的号外后，心神不安，未待天明即赴巢鸭，扣覃振寓所之门。应门者正是作证的小下女。小下女见到先梅有些狼狈，急问："吴先生你怎么了？"先梅故示镇静地说："什么事都没有。"不片刻，覃振起床，先梅首先示以号外报，并耳语昨晚刺蒋的情形。覃旋即奔赴青山，请示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听了，立遣刘白速到覃寓，传呼先梅。一面和他挚友头山满在电话中商定暂时安置吴先梅的方法，并立令先梅持函往见。大约在此案发生后四五天的光景，警局在二日内三次派人到青山"中山方"（孙先生寓所之名）探问吴先梅的行动。孙先生义正词严地诘问警员说："我问你们，吴先梅究竟到哪里去？他是因为革命失败而流亡到日本的。照国际法的规定，日本政府应该保护。现在你们警局放弃责任，不能保护吴先梅，弄到行踪不明，你们不知道反省，反来问我，这岂不是大笑话吗？你从速回去，报告你们长官，要在短时间内查明吴先梅的确切消息来回复我。"警员无词以对，唯唯而退。从此以后，警局不再为蒋案到"中山方"噜苏了。

吴先梅在头山满先生的照顾下，安然息影了一个月。待空气缓和了些，他便设法在某国轮船上的广帮水手掩护之下，潜回祖国，继续做倒袁工作。不久秘密离沪赴湘，运动军阀汤芗铭的部属反正。不幸在常德被反动师长陈复初杀害，时在 1916 年春夏之交。先梅又名星阶，湖南桃源县农家子，牺牲时年二十六七，因一心从事革命活动，未婚娶。

策反苏州独立的曲折

苏军第二师师长朱熙驻苏州，平日常与陈其美、周应时、吴藻华等周旋，并表示赞成孙先生的主张。1916 年春，周、吴等劝他一致讨袁，他唯唯应许，并约定 3 月某日宣布独立。周、吴等信以为真，即拟定改编办法，镌刻各种关防，并派遣工作人员先期分批赴苏，寓居于约定地点，听候命令。周、吴改穿和服，与几个日本人同行，先工作人员一日抵苏，寓日本租借地青阳里，以避耳目。这时各地反袁师起，风声极度紧张，在袁世凯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无不特别戒严。我当时受命负责将准备好的关防印信、委令计划等重要文物，由沪赍往苏州。适有民国女子工艺学校邵平千、邵萍青、高文斌来访。邵、高等和我有师生之谊，平日知道我为革命党人而甚同情于我。我因时机迫促，即以急欲赴苏，并将赴苏任务以及特别戒严情况告之，且示有求助之意。三生不稍犹豫，均愿同去。且由高生邀其大嫂与侄辈偕行以掩护。高大嫂本苏州人，有祖茔在虎丘山麓，于是商定办法，装作全家赴苏扫墓模样，购冥锭三篓，将印信委令等件，分藏锭篓中，即雇马车赶赴北站，时距开车时刻只有三四分钟了。站内军警多于旅客，且荷枪实弹，状极森严。我们故示急促，立刻购票向月台奔去。军警见此状况，初不料为"乱党"，并在旁做我们的拉拉队，"快！快！快！车要开了！"我们当然拼命前奔。上车仅隔数秒钟，汽笛一声，车即徐徐开动。我们一行男女大小七人，个个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车抵苏州站，已在晚间 9 时，下车者寥寥数人。因特别戒严，不准自由前去，只得逗留车站。约半小时许，有一查夜军官率枪兵十余名，前来盘问。我以赴虎丘扫墓对，并请设法使我们全家得达阊门旅舍。这位军官见我等并无可疑之处，于是点头说："好！好！你们跟我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